

中国教育六十年 纪事与启思

上册



(1949—2009)

◎ 储朝晖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储朝晖

著

中国教育六十年 纪事与启思

上册



(1949—2009)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 1949 ~ 2009 / 储朝晖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440 - 5899 - 5

I. ①中… II. ①储… III. ①教育史 - 研究 - 中国 -
1949 ~ 2009 IV. ①G52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150 号

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 1949 ~ 2009

ZHONGGUO JIAOYU LIUSHINIAN JISHI YU QISI

责任编辑 樊爱香
助理编辑 晋晓敏
复 审 张沛泓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薛 菲 陶雅娜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0351 -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55
字 数 98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5899 - 5
定 价 110.00 元 (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4120948

前 言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六十个春秋。

自秦至清，中华文化形成以儒家为根基的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以及在这一秩序中的教育体系。1840年以后，这一文明体系受到欧美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的挑战，步入艰辛乃至失败的境地。

1898年，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试图重构新的中国文明秩序，却遭遇到内部的强力抵制和外部列强的欺凌，这种局面尽管波动了近半个世纪，却一波三折顽强地向着更加文明的体系转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段相对的良好发展时期，教育也经历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下，革新良多，一大批有识之士明道济世，奋勇争先，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势头可喜，特别是在此期间出现了“黄金十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彻底打乱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断了既有的社会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社会各种力量间的平衡关系，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生态，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再一次蒙受巨大灾难，殃及教育事业，损失无法估量。

上承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1949年开启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建构新的步伐。教育是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在这六十年里，与其他各个领域相类似，教育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立足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从全球化的视角、教育理论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六十年的教育进行叙事、分析、反思、评述是本书的主题。

依据对教育发展影响的重要程度,以及在这六十年里教育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的实际情况,本书选择发展历程、教育的规模与数量、教育品质、教育价值、教育决策、教育管理、教育评价、教师成长与发展、学校管理体制等问题,在尽可能作接近原貌和全貌的描述基础上加以分析、思考。每一主题都基于历史事实,展示出六十年变迁的轮廓,分别从产生的背景、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理论和历史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

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国当今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趋势都需要中国教育在品质上有一个整体提升,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中国历史文化客观上提供了实现这一提升的一些重要前提,而现实中又存在不少阻碍这一提升的各种因素,能否创造条件使这一提升成为现实是本书力求探索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不是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体系。本书试图以上述几个主题带动对整个问题体系的讨论和思考,达到以历史材料展现教育发展的未来、从历史分析中探明教育的未来发展道路的目的。

进行这样的回顾、反思、评述,需要多年的积累,二十多年来,本人对中国教育现状进行“扫地”式的调查是思考问题的实践基础,虽然受到叙述主次关系和次序的限制不能将这些实地调查的内容写进文字中,但正是它生成了整个论述体系的框架。

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迄今还是未竟之事,我相信它将是中国人 21 世纪根本的大业。”^① 完成这一大业的前提是“必须发展出一套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来支撑对不同部门具有普遍意义吸引力的社会文化革新,从而为世界共同体提供一种总体的升级样式和模式”^②,并建立相切合的制度体系。本书旨在为这一大业添上块砖加上片瓦。

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未来。愿人类享受更好的教育,愿中国人能享受更优质、公平、人性化、高效的教育。

①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Edward A. Tiryakian. The Global Crisis as an Interregnum of Modernity [A]. The Global Crisis: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Responses [C]. Leiden: Brill, 1984: 123 ~ 130.

Contents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历程：曲折中前行	/1
第一节 新篇（1949—1956）	/2
第二节 跃进（1957—1961）	/36
第三节 调整（1961—1965）	/56
第四节 混乱（1966—1976）	/68
第五节 恢复（1977—1984）	/133
第六节 改革（1985—1988）	/162
第七节 重启（1989—1998）	/166
第八节 跨越（1999—2002）	/173
第九节 发展（2003—2009）	/176

第二章 规模与数量：跌宕起伏	/185
第一节 教育规模与数量界定及概况	/186
第二节 教育普及的规模与数量发展	/191
第三节 义务教育的规模与数量发展	/204
第四节 扫除文盲工作进展情况	/213
第五节 高等教育规模与数量变化	/231
第六节 幼儿教育发展情况	/266
第七节 远程教育发展情况	/280
第八节 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演变	/287
第三章 品质：质量与公平	/313
第一节 教育品质的界定	/314
第二节 六十年教育效能状况	/316
第三节 六十年教育公平状况	/379
第四节 六十年教育的开放	/416
第五节 教育秩序、自主性	/448

第一章

历程：曲折中前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战乱、苦难。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是尊严、和平、幸福。到1949年，这种期盼体现在教育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上就是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完全与以往不同的事业。然而这样的期盼与教育是人类千百万年的积淀以及教育发展的内在特性和逻辑并非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超越了理性的期盼，很容易被情感和主观意志所左右，这就决定着自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必然是在曲折中前行。

第一节 新篇（1949—1956）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教育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新篇肇始于《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 由于当时的《共同纲领》具有宪法的效力，所以这些关于教育的规定是当时教育上效力最高的文献。

选择在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中对中国教育发展作这样的定性表述，代表了当时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经过较长时间磨合在教育上形成的共识，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发展新中国新教育的共同心愿。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如下^②：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页。

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

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它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段对文化的论述后来被运用于教育。依据毛泽东的论述，文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由于这一政治基础是大众，所以，这一表述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意愿，还体现在当时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意愿。

当年曾在延安工作的黄乃一，1986年底在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参观时说，《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他们接受任务到处收集关于如何确定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方面的资料，当时就找到陶行知1936年发表的文章《生活教育之特质》，其中讲生活教育具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六大特质，看到这篇文章高兴极了，其中“大众的”就成为确定文化教育政策的主要基调。

《生活教育之特质》全文如下^①：

你如果看过《狸猫换太子》那出戏，一定还记得那里面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出现了两个包龙图：一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我们仔细

① 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引自《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1936年3月6日。

想想，是愈想愈觉得有趣味了。世界上无论什么事，都好像是有两个包龙图。就拿教育来说罢，你立刻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叫做传统教育；另一种叫做生活教育。又拿生活教育来说吧，你又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主张“教育即生活”；另一种是主张“生活即教育”。我现在想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指出来，目的不但要使大家知道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不同，并且要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别出来。

（一）生活的 生活教育第一个特点是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空闲工夫去学，要有名人阔佬介绍才能进去。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那么无钱、无闲、无面子的人又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吗？等待黄金时代从天空落下来吗？不！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我们钻进去越深，越觉得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生活与生活一磨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磨擦者与被磨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有人说：这是“生活”与“教育”的对立，便是“生活”与“教育”的磨擦。我以为教育只是生活反映出来的影子不能有磨擦的作用。比如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碰着一块石头，就立刻发出火花。倘若它只碰着一块石头的影子，那是不会发出火花的。说的正确些，是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磨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出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

（二）行动的 生活与生活磨擦，便包含了行动的主导地位。如果行动不在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那么，传统教育者就可以拿“读书的生活便是读书的教育”来做他们掩护的盾牌了。行动既是主导的生活，那么，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可说得通。我们还得追本推源地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须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

（三）大众的 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并且孤立地去干生活教育是不可能的，大众要联合起来才有生活可过；即要联合起来，才有教育可爱。从真正的生活教育看来，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

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四）前进的 有人说，生活既是教育，那么，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他这句话，分析是对的，断语是错的。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同在一社会里，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前进的意识要通过生活才算是教人真正地向前去。

（五）世界的 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所失掉的是鸟笼，而所得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地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六）有历史联系的 这里应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但是我们要留心，千万不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样经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地丰富起来。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地做一只小泥鳅。第二，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为着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1941年9月，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成立，其研究计划中包括“马恩列斯的教育思想，杜威教育思想，日、德、意军国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蒋介石—陈立夫教育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

平民教育，广西国民教育，等等”^①。这些研究是新中国教育大政方针确定的工作基础，是形成1949年教育文化共识的过程。所以1942年徐特立写信称陶行知“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②。1950年，陶行知的多位学生要求恢复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周恩来指示予以落实；1951年，陶行知遭到批判后，陶行知的学生们要求保留生活教育社，周恩来表示新中国办的就是生活教育，没有必要再保留生活教育社的组织了。这个孕育于1927年、成立于1938年，1949年由上海迁北京，并在上海、南京、重庆、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分社的教育社团，于1951年后被停止活动。周恩来的回答既有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也包含着逻辑上的一致性。

依据这一共识的关键词“民主、科学、大众”上溯，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这一共识产生的真实源头。再上溯则可追至谭嗣同《仁学》中首标自由与平等原则——“不失自主之权”。余英时说谭嗣同“这个提法，自然是从个体本位出发的，其中‘不失自主之权’一语确实抓住了现代人的本质”^③。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框架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是新中国各方面在继承先贤卓识和教育理念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也是衡量此后教育办得如何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基准。六十年后再回首，依然感到中国教育离这一基准还很遥远。

二、新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后简称《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提出：“人民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④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有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

① 董纯才、张健、华子扬、陈元晖、李冰洁、翟定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徐特立：《延安新教育学会致函陶行知先生》，引自《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

③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引自《现代中国的历程》，台北：华视文化公司出版，1992年版，第194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① 这两条是中国新的教育制度设置的最高法律依据，尤其是后一条暗含着国家对教育举办权和所有权的全面拥有。新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并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依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设立统筹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执行机构教育部。

1949年10月19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其职责是统筹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宜，并直接管理留学生回国事务。1949年10月18日政务院公布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大行政区在文教方面设文教委员会，并设文教等部，或在文教委员会下设文教等处。还规定中央直属的学校均由中央直接领导，并受其所在地大行政区政府之指导。这个组织通则也适用于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

1949年11月1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其职责是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

1950年1月7日，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通过省、市、县人民政府三个组织通则，分别规定省人民政府设文教厅或处，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局，县人民政府设科或局。同年11月13日政务院公布的《大城市的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中规定酌设文教科或股，12月30日政务院公布的《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中规定设秘书及助理若干人分工办理各项工作。

1950年8月2日至11日，中国教育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教育工会。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一部分，教育工会以保护教育工作者利益、提高教育工作者阶级觉悟为主要任务。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增设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4年国务院通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并入教育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的干部文化教育局也划归教育部管理。

当时，全国设立六大行政区，除华北区的高校由教育部直接管理以外，各大区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部或教育部，主要管理高等学校。1954年，随着大行政区撤销，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撤销。

在省、市建立教育厅局，各省市的教育厅局内设机构不完全一致；在专署和市、县一般设有文教科，管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项工作。1953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后，各专署和市、县都设立了教育局，少数地方称教育处或教育科。

全国各地的区、镇、乡均未设立教育行政机构，由县级教育行政机构派出辅导员或扫盲干事，负责小学教育和扫盲事业。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设教育厅、局、处；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设教育局、处；不设区的市设文化教育科或局；市辖区设文化教育科或股；乡、民族乡、镇设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人口和商业较多的镇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参照市辖区设工作部门。组织法还规定了各级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的增减、设立审批权限。12月15日，国务院在有关省人民委员会的机构的决定中规定，省不设扫盲工作机构，业务由教育厅掌管。省人民委员会设文教办公室，负责掌握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①

2. 确立新的学制

1951年8月10日，经过近两年的恢复建设，各级各类学校初步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政务院通过并于10月1日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学制。它构建了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沟通的学校系统，明确规定了工农干部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该决定指出：“我国原有学制有许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初等学校修业六年并分为初高两级的办法，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女难于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②

新学制包括幼儿教育（幼儿园：3岁至7岁前）、初等教育（小学：7岁至12岁前；2~3年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中等教育（初级中学三年，12岁至15岁前；高级中学三年，15岁至18岁前；技术、师范、医药及其他中等专业学校；工农速成中学3~4年；业余初级中学3~4年；业余高级中学3~4年）、高等教育（专科2~3年，大学或专门学院4~5年）及研究部。

新学制较大的变动是将小学定位为对儿童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合并原来的初小和高小，实行五年一贯制。1952年，教育部发布实施的指示，但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困难。1953年11月，政务院在《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关于小学五年一贯制，从情况看来，由于师资教材等条件准备不足，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② 《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不宜继续推行。因此从本学年起，一律停止推行。小学仍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级。”^①

新学制另一个较大变动是增加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形式，认可了此前已经产生的工农速成中学在学制中的地位。自1950年4月3日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北京开学到1954年，全国的工农速成中学已有87所，调配干部、教师3700余人，共招生6.47万人。工农速成中学的开办，为工农干部、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新路。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这一变化适应了当时受教育者和社会各行业人力需求的需要，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已证明对社会建设是十分有意义的。

3. 建立了政治思想教育制度

政治思想制度是新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提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第四十七条还提出“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②。1950年6月17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其中就专门总结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③。政治教育成为新中国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内容之一，并为此建立了系统严密的制度。

在解放军接管学校的时候，便要求学校取消原有的训导制度，推行民主管理；取消“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课程。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49年10月颁布的《华北专科学校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和《大学专科学校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分别规定了各年级必修“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各院系要“废除反动课程，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④。

1949年，教育部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指示就是办冬学。冬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又是政治教育，其中还包括解释“为何要实行‘一面倒’，必须加强中苏友谊和维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

①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